

罗素自传

第二卷 1914—1944

〔英〕伯特兰·罗素 著

陈启伟 译

世界名人传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罗素自传

第二卷 1914-1944

〔英〕伯特兰·罗素 著

陈启伟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素自传. 第2卷, 1914—1944/(英)罗素著; 陈启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100-10815-7

I. ①罗… II. ①罗… ②陈… III. ①罗素,
B. (1872~1970)—自传 IV. ①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070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罗素自传

第二卷

1914—1944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陈启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815-7

2015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8% 插页 1

定价: 6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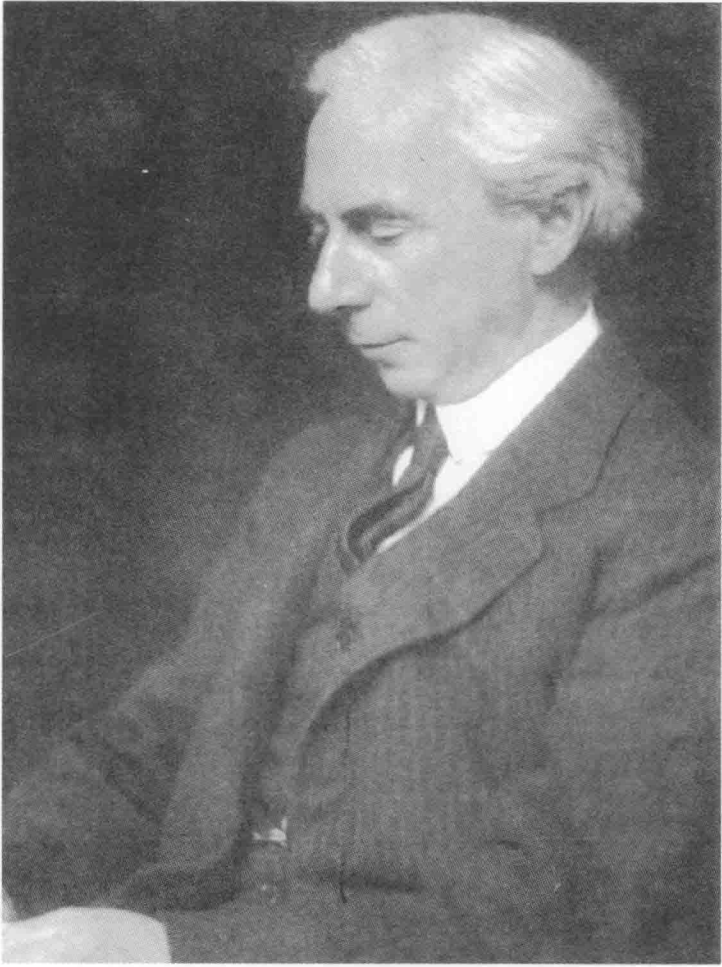
Bertrand Russell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ume Two first published by George Allen & Unwin 1968

Reprinted 1991, 1993, 1995 by Routledge

本书由英国卢德里奇出版社授权，
根据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 1968 年版译出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新版说明

本馆出版名人传记渊源有自。上世纪初林纾所译传记可谓木铎启路，民国期间又编纂而成“英文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其后接续翻译出版传记数十种。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汇涓成流，结集出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广为传布。

此次重新规划出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续写经典、重开新篇。丛书原多偏重学术思想领域，新版系统规划、分门别类，力求在新时代条件下赋予作品新价值、新理念、新精神。丛书分为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发明以及除上述领域之外的综合类，共计五大类，以不同的封面颜色加以区分。

丛书所选人物均为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名流巨擘，他们的业绩和思想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甚至塑造了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所选传记或运笔于人物生平事迹，或着墨于智识求索，均为内容翔实、见识独到之作。读者于其中既能近观历史、反思现实，又能领悟人生、汲取力量。

我们相信名人传记的永恒魅力将为新时代的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我们也期待能得到译界学界一如既往的支持，使此套丛书的出版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年12月

被亵渎的神殿

威廉·布莱克

我见过一座全金筑成的教堂，
没有人胆敢迈进它的门墙，
许多人哀泣着伫立门外，
流泪，悲叹，顶礼膜拜。

我看见一条巨蛇
在白色门柱间耸起，
它猛施暴力，猛施暴力，猛施暴力，
直至把黄金的门键咬啮得破碎支离：

沿着那散发着芳香的甬道，
那镶满了珍珠宝石的甬道，辉煌灿烂
它拖曳着闪亮的细长的躯体
一直爬上了纯洁的神圣的祭坛。

它喷出它的毒汁
洒满面包和酒的圣餐，
于是我转过身来进入一处污秽的猪栏，
而倘佯于猪猡们之间。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 1
第二章	俄国	/ 144
第三章	中国	/ 189
第四章	第二次结婚	/ 230
第五章	在泰利格拉弗宅的最后岁月	/ 302
第六章	美国：1938—1944	/ 349
索引		/ 424

插图目录

泉 目

1. 康斯坦丝·马勒森夫人（科莉特·奥妮尔） / 29
2. 弗兰克·罗素 / 30
3. 付了 100 英镑罚金之后：伯特兰·罗素
同利顿·斯特雷奇和奥托兰夫人在一起 / 95
4. 多拉·布莱克 / 96
5. 伯特兰·罗素同约翰和凯特在一起
凯特·罗素 / 161
约翰·罗素 / 161
6. 伯特兰·罗素 / 162
7. 1938 年的伯特兰·罗素
有伤风化的椅子 / 291
8. 帕特里夏·斯彭斯（后来成了罗素夫人） / 292
9. 康拉德·罗素 / 357
10. 伯特兰·罗素在里士满他自己的家里 / 358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15

从1910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是一个过渡时期。我的生活在1910年以前和1914年以后，就如浮士德的生活在遇见梅菲斯特之前和之后一样，截然有别。我经历了一个重新焕发青春的过程，由奥托兰·莫雷尔开其端，又为战争而继续。说战争会使人恢复青春似乎很怪，但是事实上它使我摆脱了一些成见并使我重新思考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它还提供给我一类新的活动，对这类活动我并不感到乏味，而这种感觉每当我试图回到数理逻辑上去时都困扰着我。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认为自己是一个并不超凡出世的浮士德，对我来说代表梅菲斯特的就是这场大战。

7月末炎热的日子，我在剑桥，和所有的人讨论时局。我觉得不能想象欧洲会疯狂到陷入战争，但是我相信，一旦有战争，英国是会卷进去的。我强烈地认为，英国应当保持中立，而且征集了很多教授和研究员在以此意发表于《罗彻斯特卫报》的一份声明上签名，到了宣战的那天，他们几乎全都变了卦。回首当年，人们竟没有明白地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似乎有悖常情。我在本书第一卷中曾提到，8月2日星期天，我遇见凯恩斯

匆匆穿过三一学院的大院去借他表兄弟的摩托车赶往伦敦。^①不久我发现政府派人来召他去提供财政咨询。这就使我明白了英国加入战争已迫在眉睫。星期一一早我决定去伦敦。我在贝德福广场同莫雷尔夫妇一起吃午餐，发现奥托兰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她赞成菲利普要在下院发表一篇和平主义的演说的决定。我继续
16 到下院去，期望听听爱德华·格雷爵士^②的著名声明，但是人群拥挤不堪，竟无法进入。不过，我得知菲利普已经适时地发表了他的演说。傍晚，我绕着马路散步，特别是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一带，我留心地看着那些兴高采烈的人群，让自己感受一下过往行人的情绪。这时和随后的几天，我惊讶地发现，普通的男女对战争的前景都很高兴。我曾经愚蠢地以为，战争是奉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专制政府强加给并不心甘情愿的民众的，这也是大多数和平主义者的看法。前些年我已注意到，爱德华·格雷爵士如何处心积虑地说谎，以使民众不晓得他是用什么办法让我们大家都答应在发生战争时要支持法国的。我曾天真地以为，当公众发现他怎样对他们说谎时，就会对他感到恼怒而厌恶了；然而相反，民众却对他表示感激，因为他使他们减轻了道义的责任。

8月4日的早晨，我和奥托兰在大英博物馆后面的街上来来回回地散步，那里现在已经是伦敦大学的一些楼舍了。我们沮丧地讨论着未来。当我们向别人谈到我们所预见的灾祸时，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发疯了；然而结果证明，同事实^③相比，我们倒是只会预卜小灾小难就唧唧喳喳叫的乐观派了。4日晚，与乔治·特

① 他的表兄弟是 A. V. 希尔，一位卓越的医学家，他住在我隔壁的楼梯间。

② 爱德华·格雷爵士（1862—1933），1905—1916 年任英国外交大臣，奉行亲法反德和联合俄国的政策，一次大战爆发后，促使内阁对德宣战。——译注

③ 指不久后发生的一次大战。——译注

里威廉沿着整条斯特兰德大街一路争吵，之后去参加了格雷厄姆·沃拉斯任主席的一个中立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中间突然爆发一声雷鸣般的巨响，委员会的老会员们都以为是一颗德国炸弹。这就把他们赞成中立的最后一点点感情也驱散无遗了。战争爆发后的最初一些日子，我感到大吃一惊。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如怀特海夫妇，都持异常激烈的好战态度。又如 J. L. 哈蒙德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撰文反对参加一场欧洲战争，却被比利时弄得狂热好战起来。我早就从参谋学院的一位军人朋友那里听说，比利时一定会卷入战争，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些大有名望的政论家们如此之轻率浮躁，竟对这种至关重要的大事无所知闻。《国民报》每周星期四照例有一次同仁午餐会，8月4日的这次午餐会我去参加了。我发现，主编马辛汉激烈反对我们加入战争。我提出要为他写一篇文章，他热情欢迎。次日，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开头就说：“今天不是昨天”，并说明他的意见已全然改变。不过，他还是将我的一封反战的长信发表在下一期的《国民报》上^①。究竟是什么使他改变了主张，我不知道。我晓得阿斯奎斯的一个女儿在8月4日午后晚些时候曾看到他到德国大使馆的台阶上走下来，而且我隐约觉得，他也许因此而受到警告，说在如此危难之际缺乏爱国热诚是轻率愚蠢的。在战争开头的一年左右，他一直是爱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这样的。有些主张和平主义的国会议员连同二三同情者开始在贝德福广场莫雷尔的家中举行聚会。我常去参加这些聚会，由此聚会中就产生了民主监督同盟。我很感兴

^① 该信全文见本书第42页。（指本书边码，下同。——译注）

趣地看到，许多和平主义的政治家更为关心的是他们当中谁来领导反战运动，而不是反战的实际工作问题。不过，他们都是应该发动的，而且我竭力把他们往好处想。

那时，我正处于最大可能的情感紧张状态。尽管我并没有预见到战争的全部灾难，但是我确比大多数人所预见的要多。战争的前景使我满怀恐惧，但是使我尤感恐惧的却是这个事实，即：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在预料到战争造成的屠杀时竟是极大的欢乐。我不得不修正我对人性的看法了。那时，我对精神分析毫无所知，但是我对人类感情的观点却与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并无二致。我是在力求理解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群众情绪时得到这个观点的。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父母爱自己的儿女是人之常情，但是战争使我相信那不过是一种罕见的例外。我曾经以为，人们大都爱财甚于爱别的任何东西，但是我发现，他们甚至更喜欢毁坏。我曾经以为，知识分子总是爱真理的，但是我在这场战争中又发现，知识分子中宁爱真理而不沽名钓誉者不足百分之十。吉尔伯特·默里自1902年以来一直是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在我没有支持布尔人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亲布尔派了^①。因此我自然希望他会又一次站在和平一边；然而他却一反常态，写文章骂德国人的邪恶，而赞颂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超人美德。我对于那些将遭到杀戮的青年们充满了绝望的爱惜之情，而对所有欧洲的政治家们则感到怒不可遏。在几个星期里，我觉得如果碰巧遇到了阿斯奎斯或格雷，我会禁不住去把他们杀了。不过，这些个人的情感渐渐地消失了。这场悲剧之严重，以及对于仅仅由这些政

^① 指在1899—1902年英国人与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的战争中支持布尔人。——译注

治家的放任纵容而酿成的群众暴力的亲身体会，把我的这些个人的情感给吞噬以尽了。

在这中间，我自己备受爱国心的折磨。在马恩战役之前德国人的胜利令我恐惧。我像任何一个退役军官那样热切期望德国人战败。对英国的爱几乎是我所具有的最强烈的感情，而在这样一个时刻看来要把它抛开，我是在做一个非常困难的决裂。但是，我对于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从无片刻的犹疑。有时我被怀疑论所麻痹，有时我抱着犬儒派的人生态度，另外的时候我对世事漠然处之，但是当战争降临的时候，我觉得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的使命是提出抗议，尽管抗议可能是徒劳无益的。我的全部生命力都卷入其中了。作为一个热爱真理的人，所有交战国的民族宣传都令我厌恶。作为一个热爱文明的人，向野蛮的倒退使我惊骇。作为一个早失父母亲情的人，对青年人的大屠杀使我心痛欲碎。我并不认为反战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是我觉得，那些没有被狂热冲昏头脑的人应该表明自己是坚定不移的。目睹运送士兵的火车开离滑铁卢站，我总是有一种奇异的幻觉，似乎伦敦并不是一个在现实中存在的地方。我常在想象中看见伦敦的那些桥梁塌陷、沉没，整个这座大城市像晨雾一样消逝了。伦敦的居民也开始变得仿佛是虚幻地存在，而且我甚至怀疑我以为自己一直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否只是由于发烧引起的梦魇的产物^①。不过，这种心情为时不久，因为忙于工作很快就过去了。

战争的最初阶段，奥托兰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和激励。如果没有她，最初我会是完全孤独的，而她无论在憎恨战争这一点上，

^① 我曾将此想法对 T. S. 艾略特谈过，他写入了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

还是在拒不相信那些充斥世界的神话和谎言方面，都是毫不犹豫的。

桑塔亚那当时正在剑桥，同他的交谈使我得到些微的安慰。他是一个中立者，而且无论如何他并不十分关心人类是否会毁灭自己。他那恬静的哲学的超然风度，虽非我所欲仿效的，却给我以慰藉。马恩战役前夕，当时看来德国人一定会很快拿下巴黎，他竟梦呓般地说：“我想我非得去一趟巴黎不可。我冬天穿的衬衣还在那儿，我不乐意让德国人把它们拿去。我还有另外一个虽然较不重要的理由去巴黎，那就是我有一部书的手稿放在那儿，最近10年我一直在写这部书，不过我对此并不像对那些衬衣那么在意。”不过，他并没有去巴黎，因为马恩战役为他解除了忧虑。但有一天他却对我说：“我明天要到塞维利亚^①去，因为我希望到一个人们并不克制自己感情的地方去。”

10月份秋季学期开学，我又必须开始讲授数理逻辑了，但是我感到这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于是我着手在剑桥教师和研究员中间组建民主监督同盟的一个支部，在三一学院有相当多的教研人员最初持同情的态度。我也在大学生的集会上发表演说，¹⁹他们很乐于听我讲话。记得在一次演讲中我说：“妄称德国人是邪恶的，那完全是胡说”，出乎意料的是，全场热烈鼓掌。但是，随着葡萄牙卢西坦尼亚的陷落，一种更可怕的风气开始占据上风。人们似乎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要为这个灾难负责。曾经参加民主监督同盟的教师和研究员中间，有许多人这时已得到任命被擢升了。巴恩斯（后为伯明翰主教）离开三一学院到伦敦圣殿

^① Seville, 西班牙西南部的城市。——译注

律师学院做院长去了。老的教师和研究员们都变得愈来愈歇斯底里，我开始发现自己在特设餐桌^①上被人们敬而远之了。

整个战争期间，每过圣诞节，我感到万念俱灰，这种完全绝望的心情使我什么也不能做，只有待在椅子上，纳闷人类究竟有什么用处。1914年的圣诞节，经奥托兰的劝告，我找到了一个令绝望的心情不那么难以忍受的办法。我开始以一个慈善委员会的名义去访问那些贫苦的德国人^②，调查他们的生活境况，以救济他们的穷困，如果他们应该得到救济的话。在这件工作过程中，我碰见一些在战争狂热里显现出来的和善仁爱的突出事例。在贫民区一些女房东本身虽然也穷，却让德国人不付分文房租地住下去，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因为她们知道德国人已经不可能找到工作了。不过这个问题随后不久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德国人全都被扣押了，但在战争开头的几个月，他们的状况是很可怜的。

1914年10月，有一天我在新牛津大街遇见T. S. 艾略特。我不知道他此前在欧洲，这时才发现他是从柏林来英国。不用说，我问起他对这场战争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那就是说，他认为为杀人找出任何借口都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同他，后来也同他的妻子（他们于1915年初结婚），成了亲密的朋友。在他们穷困至极之际，我把我的住宅的两间卧室之一借给他们，因而我同他们时常见面^③。对他们夫妇二人我都很喜欢，而且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尽力去帮助他们，直到我发现他们原是以苦为乐，才停止对他们的

① High table, 英国大学饭厅中专为院长、导师和主要宾客所设的餐桌。——译注

② 此处应指在英国的德国侨民。——译注

③ 不过，有时人们以为我们中的一个影响了另一个却是毫无根据的。

帮助。我持有一家工程营建公司的票面值为 3000 英镑的一些债券，在战时这家公司自然要制造军火，因此我在良心上深感不安，不知如何处理这些债券，最后我把它们都送给了艾略特。几年以后，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也不再穷困了，他把这些债券又还给了我。

1915 年夏，我写了《社会改造原理》或《人们为何而战》一书，后者是未经我的同意在美国印行时用的书名。我本来没有打算写这样一本书，而且它与我先前写的任何东西全然不同，但是它不由自主地就出来了。事实上直到写完了它，我才发觉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它有一个框架、一个方案，但是只是在除了开场白和结束语之外什么都写好了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是有一个框架并提出了一个方案的。在此书中我提出了一种政治哲学，它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冲动较之自觉的意图在塑造人的生活上起的作用更大。我把冲动分为两类：占有的和创造的，认为最是建立在创造性冲动之上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我以国家、战争和贫困作为占有的冲动的具体例子，而以教育、婚姻和宗教作为创造的冲动的具体例子。我相信，把创造性解放出来应当成为社会改革的原则。这本书最初是一些讲演的稿子，后来出版了。出乎我的意料，它一问世立即获得成功。我写它本不指望人们会去读它，而只是作为一种信念的表白，可是它给我挣来了一大笔钱，而且为我后来的一切收入打下了基础。

这些演讲在某些方面同我与 D. H. 劳伦斯的短暂的友谊有关系。我们都认为在改革人类关系问题上有某种重要的东西要说，但是我们开头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对需要采取何种改革的观点正好相反。我同劳伦斯的交谊是短暂而热烈的，总共持续了一